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

契合与奇迹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魏晓东 / 著

开明出版社

Kai Mi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 —北京:开明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133-487-6

I. 中… II. 中… III. 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704 号

契合与奇迹——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著者 魏晓东

出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印刷 保定市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大 32 开 印张: 6.375 字数: 154 千字

版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3-487-6/I·23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选择

- 一、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新文化运动
..... (1)
- 二、在中西文化比较、鉴别中的选择..... (16)
- 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 (28)
- 四、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及贡献..... (37)

第二章 根植中国文化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影响

- 一、中华民族解放的新思维与新道路
——影响之一..... (44)
- 二、由独立走向自强——影响之二..... (56)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拓展

- 一、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 (68)
- 二、把握时代发展脉搏..... (87)
- 三、重定中国历史坐标..... (95)
- 四、开辟“三位一体”结合新途径..... (101)

第四章 奇迹的诞生

- 一、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 (107)
- 二、继承与超越..... (115)
- 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统一..... (124)

第五章 中西文化契合的历史启迪

- 一、科学认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 (147)
- 二、反对教条主义思维模式..... (158)
- 三、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 (163)

四、把握“结合”的关键·····	(172)
五、领导者的主观因素至关重要·····	(176)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瞻	
一、世界形势的变化、特点及走势·····	(184)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87)
后 记 ·····	(194)

第一章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化发达的西方，它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扎根并且开花结果，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那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怀疑与争论的漫长历史进程。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一次次证明其新兴资本主义比之封建制度优越时，也是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列强成为榜样的时刻。从那时起，伴随着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真理的足迹，中与西、新与旧之争贯串了整个近代中国并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先驱者们对西方的探究，经历了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起步，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科学。与这个认识逐步提高的是对文化的探讨逐渐接近科学。从“器变道不变”开始，进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进而接受、阐发进化论。当“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把民主与科学放置在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解释时，马克思主义这种诞生于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自然就被当成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加以学习宣传和运用。

一、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 困惑与新文化运动

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起步很早，但真正以列强为榜样，把自强的希望寄托在向西方寻找真理，还是从鸦片战争溃败后开始的。在

鸦片战争中，中国以相当于中世纪的各种武器（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对付已步入近代化的敌人，结果是战争以残酷的事实暴露了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战争硝烟散后，侵略者以租界的方式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搬进了古老的中国沿海口岸，在那里建起了国中之国，由此展开了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控制与掠夺。于是，忍受着民族被欺凌的巨大耻辱，一部分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仔细观察。他们“由直观而生羡慕，由羡慕而生比较，由比较而生追求”。先驱者们首先举起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大旗。此后，又沿着“中体西用”，到君民共主再到资产阶级共和一步步深入。其基本思路是由生产技术到政体再到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以前，先驱者们眼中的“西学”以及对“西学”的追求有一个渐次提高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期间，少数人开始从地理学入手来了解西方社会的政治与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是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著作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西学的“长技”主要表现在此。

19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围绕军事技术研究西学。对“制器之学”的探究，导致了对声、光、化、电、数学等学问的翻译与了解。

70至8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由自强到求富的转变，先进知识分子对科技更为关注。认为，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故而对西学的要求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而进一步提高，视野也逐渐开阔。此间，一些机械炼铁、机器采矿、交通运输、纺织等民用工业相继出现。所译西书，也以科技为最。

由科技而到政治制度。80至90年代，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议院的向往，是学习西学的一大突破。虽然最初提倡“议院”，仍然主要是把它当作“西用”来接纳，并未改变“中体西用”的意向。

但议院与民权紧密联系着，它的实行，其结果必然要削弱君权，并由此而动摇“中体”。经过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完全详细地描绘了一幅西方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

由制度而及思想学说，在严复之前，就有人对西学的源流有所考究。“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① 尔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原富》，使中国人更多地获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

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学在认识上的深化。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则将这个认识直接变成了追求的具体行动。应当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竭尽全力的。但一次次的奋斗，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后，人们看到的仍是西方的继续强大和中国的日益衰落，困惑因此而产生。“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② 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觉得社会文化是整体的，要拿旧的心理去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故而渐渐要求人格的觉醒。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黑暗现实为认识起点，由此而追溯到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矛头直指旧的思想、道德。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

① 参阅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独秀认为：“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① 并且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结果是他们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即“民主”和“科学”。

所谓民主，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而且还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专制同共和是不能并存的，因而他们首先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专制政治，又针对民国初年尊孔读经的逆流对封建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儒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它有如狂飙巨澜，无论激烈程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无古人的。

首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指出封建伦理道德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它是帝制产生的根源。

针对封建复古者“锐意提倡”封建伦理道德，大搞尊孔复辟活动，陈独秀连续著文，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西学”的先进性，揭露封建旧道德反动的实质。对康有为之尊孔“不与民国相抵触”的论调，予以反驳。讽刺康氏主张民国之祭孔，不正像主张专制国之祭华盛顿与卢梭一样自相矛盾吗？因为“孔教之根本”乃“三纲五常”，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②。孔教的实质为阶级制，它“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所以，别尊卑之旧道德与近世文明社会以自由、平等为内容的道德与政治极端相反。由此观点出发，陈独秀进一步论述道：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7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8页。

“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全然相反，“万万不可调和”。中国不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对儒学不进行批判，就不会有新的思想、新的学说产生，因而也就不会造成新国家。

其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揭露了封建旧道德是剥夺“独立人格”的“奴隶之道德”，与现代生活如水火不能相容。

“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这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排孔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的观点。几乎所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谈到这个问题。然论述最有深度的，还数陈独秀、李大钊。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以经济学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及经济学产生之大则，其影响及于伦理学。因而“现代伦理学上个人独立人格，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那么，封建旧道德是否与现代生活要求“个人独立主义”相适应？回答是否定的。旧道德“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主义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这是旧道德与现代生活矛盾之一。从政治上分析，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个人“莫不发挥其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然而“三纲之说”则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臣、为子、为妻者完全丧失“独立人格”，而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是旧道德与现代生活矛盾之二。此外，还对当时一些人主张把旧伦理道德与现代生活加以调和的思想予以否定。

再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驳斥了封建旧道德的维护者所谓“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的道德不变论。

康有为等尊孔复古者，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道德革命。认为道德“岂有新旧中外之或殊哉”，把孔教说成

是“恒百代而常新”的道德准则。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为，人类社会时时在发展变化，而产生于社会之上的任何一种学说都将随之不断更新。独尊一种学说，使其学说成为万代不易之宗，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之妄想。“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论，又焉能外”。以西方社会为例，说明了欧美既不为古代圣人亚里士多德所拘囚，且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其根本原因是“以其生活状态有异于前也”。旧道德怎么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从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与旧道德的基本内容上，陈独秀较为深刻地分析了旧道德与新社会相互存在的矛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的道德为封建时代之道德，所主张的政治也是封建时代之政治，根本无法适应几千年后的文明社会。从而指出康有为等复古者“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的主张，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近代起就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且说好的就是皆好，坏的就是完全坏，所以明显有“全盘反传统”倾向。在这种观点的误导下，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多少年来总是以全盘反传统文化的面目出现在学者们的论著之中。尤其是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推动者，因此而长期不得正名。

的确，新文化运动有过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但从主流来观察，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要绝对否定、抛弃传统文化。笔者曾在1991年发表《陈独秀的道德观浅论》一文^①，阐述了个人的一点浅见。这里仍愿就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简单论证，意在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全盘反传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占主流，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更不是代表者。

第一，说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反传统”占主流不符合情理。首

^① 见《兰州学刊》1991年第4期。

先，我们说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了旧的封建文化思想，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那么，如果是形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话，怎样去理解、解释它的这个历史功绩呢？其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发起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如果把中国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了，又谈何救国与救民呢？笔者不敢也不能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有一些人也包括陈独秀的确说过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话，但纵观他们的主张，那只是一时激愤而已。如同一个医生想要救活一个病危的人，当看到病人家属、医生助手等漫不经心时，他大声疾呼病人已经死了，再也无法挽救。这是为唤起他们的重视，希望各方配合把病人救活。如果医生真是认为病人根本无法挽救，就不必要去那样做了。同理，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的一些过激言论，恰恰证明，他坚信只要唤起全体中国人的觉醒，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困境而逐步强大起来。这一现象也是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第二，陈独秀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新文化运动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限于篇幅，这里不便展开论述。仅就“忠”、“孝”道德观，我们就可以看清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自古以忠、孝为美德。但陈氏则认为这不过是“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的片面义务。欲建设现代文明国家，三纲之说必弃。然而我们发现陈氏并不是因此而简单地主张将这些传统道德抛弃。他的看法是：“节孝必出于自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①很明显，他是把“主观自动”及“客观被动”作为判断忠孝有无价值的标准。若出于被动行为当然是“奴隶之道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7页。

德”，若出于“主观自动”呢？“然其说倘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①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爱国行为，陈氏给予热情的歌颂。认为这些民族英雄才是真正的“忠孝义烈”，号召人们学习他们。我们“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把我们中国古时荆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这班大英雄的事迹，排上新戏，要做的忠孝义烈，坚持激昂慷慨，真是世道人心，大有益处”。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又进一步阐述了对孝悌的观点：“我们不满意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滑头了。”现代文明社会不是不要孝悌，而“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陈氏还对那些“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他的慈爱的、可怜的慈母”的不孝之子，以严厉的批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陈独秀不仅没有全盘否定忠、孝等旧道德，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给它们赋予了新意。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一大贡献。

与民主紧密联系的是科学。今人研究新文化运动，往往将其理解为反对鬼神迷信。的确，反鬼神是当时所提倡“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有过较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内涵更重要的还是指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原则。

仔细推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追求，自晚明就已起步。只是由于随后清代的闭关，才使徐光启、王徽等人的研究没有被承继下来。前文在论述中国人的“西学”观时就已指出，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师夷之长技”的口号。但从其内容观察，仍主要是局限于在制造技艺方面的模仿，而对从事科学研究重要性仍认识不足。甲午海战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7页。

推行“变制”时，意识到中国之患以“愈愚”为最。而与中国相比，西方“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本斯而起”。也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科学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光照搬西方的机械制造技艺，并非根本。因而学习隐藏在“坚船利炮”背后的“黜伪崇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才是关键所在。此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愈加关注对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他们倡导而组织的各种科学团体相继在中国诞生。

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仅表现为对自然界无数奥秘的揭示。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与人的求知精神有关，也与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化的民主政治有内在联系。这里，科学思想和方法对于一个要求自强的民族显得更为重要。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先驱者们把民主与科学结合起来，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则而提倡、宣传、接受，是其一大贡献与突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有一段话为后人十分熟悉，“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而“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从此，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当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民主与礼教对立、科学与迷信相悖，旧的伦理、政治、宗教是对人权的摧残和对科学的无知而必须反对时，当他们用民主和科学来概括西方文明的精华时，便不再在民主政治和君主之制孰是孰非的圈子里徘徊，而是转向探索科学在民主社会的欧美为何能够发达，在中国却屡屡失败的缘由。于是他们的认识开始由制度的层面楔入到思想文化的深处，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觉悟和缺乏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是不可能建成“西洋式的国家”的。因此，发生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时代，把民主和科学作为判断一切社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8页。

会现象的价值原则，力求建立“西洋式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它一开始就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以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以近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礼教，力图建立以自我为价值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但它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的运动，更重要的还是现代价值的重建。民主与科学不仅是“五四”反传统的理论依据，也是现代价值重建的目标。这样，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广泛而极其深远、持久的。

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直接衔接起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其影响之一。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的转折点，但这个转变的完成还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新文化运动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完成。这是由新文化运动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这个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革命受其影响，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有了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得到较快发展。同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逐渐壮大，而在意识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反映，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

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一身二任。它既要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及其思想文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又要顺应十月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运动高涨的新趋势，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以推动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发展。以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开始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直到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以前，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人权说”之上，因而，对中国的根本出路提不出科学的方案。十月革命消息传入中国后，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鼓舞。虽然他们还不能够正确认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但已经意识到这次革命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从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出发，对十月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和同情。这就使新文化运动和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起来。具体表现在：

（一）新文化运动由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开始转向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李大钊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说，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此后，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进行了宣传。同时期的陈独秀、鲁迅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愿意在那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二）新文化运动反映了世界革命潮流的信息。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考虑，也出于对十月革命指导功能和榜样力量的考虑，“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之后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的革命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在《每周评论》上，报道了俄、德、匈、朝等国的革命信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中国强大而努力奋斗的人民。

(三)旅俄华工回国,在一定强度上对新文化运动以直接影响。据统计,新文化运动时期,有4万左右华工陆续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人参加过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战斗,有的还亲自聆听过列宁的教导。他们于1918年12月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向祖国阶级弟兄呼吁,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回国后的华工,积极参加反对封建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以亲身参加十月革命的经历,宣传民主与科学,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弥补了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不足,在客观上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

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先导。此其影响之二。

关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的卖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而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则是直接导火线。这种解释,没有把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当作一个重要因素,显然是有缺陷的。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五四”前早就开始了,但为什么没有爆发像“五四”那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而只有到这时才发生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因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导致思想界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的姿态出现。他们对封建帝制以及为此服务的思想文化的批判,符合“备受专制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愿望。也使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军阀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民主与科学随之深入人心。对十月革命的宣传,更加唤醒了中国人的觉悟和信心。所以,当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机时,民主与科学的觉悟便转化为民族救亡运动的火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分析“五四”运动

时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革新思潮“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①。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单纯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卖国以及巴黎和会失败去解释“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是不全面的。应该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一个深层原因。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在中国的长期统治，使这个绝对权威从其神圣宝座上开始跌落下来。此其影响之三。

孔子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权威。孔子的学说自西汉始，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在这个结合的漫长过程中，贬抑或相互争夺皇权者代有人出，正面非孔者绝少。皇权虽然不断更迭，而孔学的权威却一再加重砝码，从未动摇过。其结果是，孔学由最初的一家学说而被定为一尊，孔子本人则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思想、学说被封为“万世之至论”，不仅支配着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社会行为，而且经历漫漫数千年也融化到国民的信仰、情感、风俗习惯之中，无所不在。它成为判断一切的价值准则。在孔学面前一切新学说、思想，无论来自何方，都成为异端邪说。对孔学稍有怀疑就是“离经叛道”。这种精神枷锁对中国人民的禁锢，是造成中国愚昧落后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几千年来神圣不可触犯的孔学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指出孔学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它是帝制产生的根源，“三纲五常”是剥夺“独立人格”的“奴隶之道德，与现代生活如水火不能相容”。新文化运动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以致命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9页。